

李侃
主编



瞿林东 著

此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 史学家系列 ·
李侃 主编

杜
预

评传

“九五”重点图书规划

—— 创典制通史 汇治国良模

瞿林东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

杜佑评传

——创典制通史 汇治国良模

瞿林东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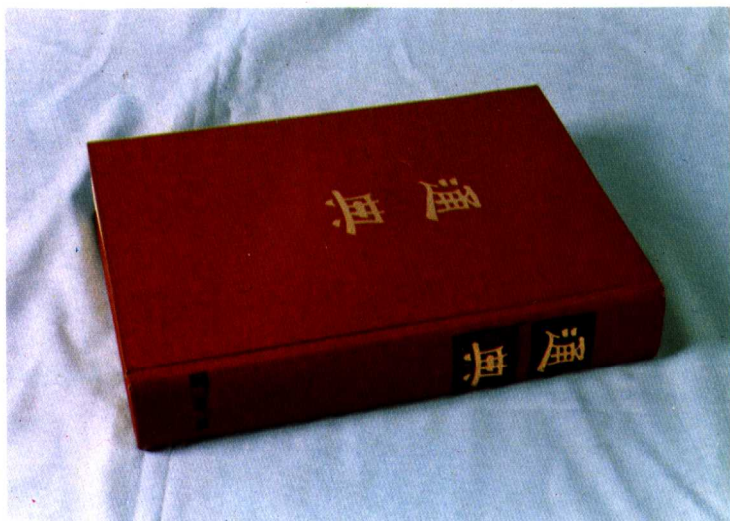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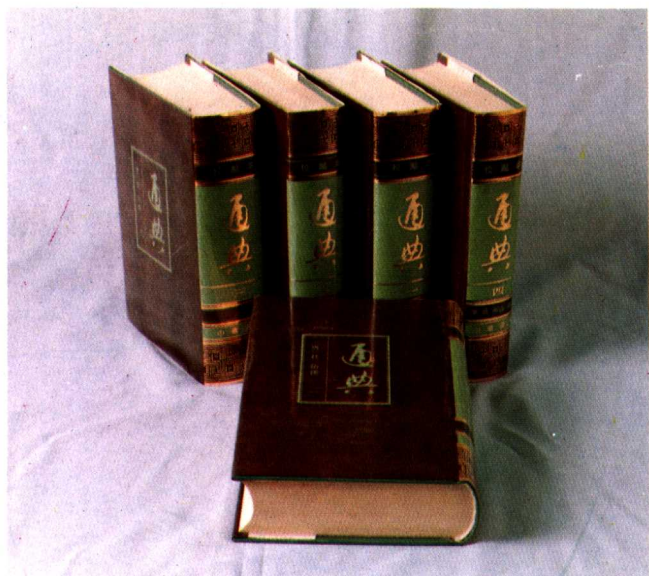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5.75印张 插页8 130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1—6000册

ISBN 7-5435-2414-7/K·70 定价：11.20元

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1988年12月出版



中华书局据原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重印《通典》，1984年2月出版

建通典表

臣佑言臣聞太上立德不可庶幾其次立功道行
當代其次立言見志後學由是往哲遞相祖述將
施有政因一邦家臣本以門資叨登官序仕非遊
藝才不逮徒懷自強頗敢墳籍雖復歷叨幸
或職別弘聖竊惜光陰未嘗輟廢夫孝經尚書詩
禮易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
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率多
記罕存法制愚管窺測豈達精深輒肆荒唐試
爲意更每念惜學異探政經略歷代東賢高論

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日本宮内庁書陵局所
藏北宋本《通典》(一)

通典卷第二

食貨三

田制下

水利田

屯田

田制下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宋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
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從異定疆無田之人謂之無田之人
鄉以處之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武成帝河清
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
皆營農桑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農桑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
史聽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凡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
令便得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
租調二十充六十免力役六十退田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窮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
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或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武
貴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貴以上各有差職事
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承墾田唐書地理志曰唐制凡民無田者曰無田之人墾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
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

通典卷第一

唐京兆杜佑卿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忽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和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玉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廢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爲

御製重刻通典序
稽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以及累朝名物制度
因草損益之詳紛綸浩博
散見典籍未有統貫唐宰
相杜佑於為淮南節度書

清乾隆撰《重刻〈通典〉序》（乾隆十二年梁詩正奉敕書）
武英殿本，同治十年廣東學海堂重刊

卷 首 语

他是一位史学家，他的皇皇巨著，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又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赫赫政绩，是唐代政治史上光彩的一页。

他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他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他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

他是一位在唐代文化史和政治史上都建立了丰碑的人。

谨以这本小书作为对这位杰出的史学家和政治家——杜佑——诞生 1260 周年的纪念。

《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

总 序

戴 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数有益的东西。这其中包括加深对国情的了解、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也包括汲取有益的政治经验、治国方略、管理方法，至于其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哲学智慧、科学思想则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和素材。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是广大人民群众。一切文化现象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体现。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形成了文化的不同门类。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覆盖面更为拓展，文化的内涵日益深邃，在各部门类的文化活动中也涌现了各自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或者著书立说以成一家之言，或以自己的言论形成一种思想体系，或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他们努力钻研，求实创新，把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步步推进，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这些文化名人如群星璀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数量之多真如恒河沙数。我们把这些明星贯穿成线，就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史。

广西教育出版社倡议编写出版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一项有卓识有魄力之举，因此立即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响应，在几位著名学者主持下，分别组成各系列的写作队伍。由于作者大多长期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因此很快完成了一批书稿。以作者队伍整齐，书稿质量高而言都是少见的。

本系列丛书没有采用学术著作的传统写法，也不对历史事实作子虚乌有的夸张演义，而是本着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传主的活动作尽量生动活泼的叙述。作者的观点或通过分析评论表述，或者寓于史实的叙述之中。对于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则尽量融会吸收。

本丛书所拟定的传主选题，代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各方面，虽然各位传主卓然成家，足以彪炳史册，但却并非一定是完人。在他们身上既有耀眼的光华，又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历史和个人的局限，甚至不无糟粕。这与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称颂、肯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时，也要取这样的态度。

最后，我要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感谢丛书的各位主编、作者和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希望本丛书能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作用。

是为序。

1994年5月

序

李 侃

尊重历史，编纂史书，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优良传统。

古人有很多重视历史的精辟言论，如“彰往而察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史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

正是由于对历史的重视，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才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代有创新，不断发展，也才能够使得在经过千百年之后，后人还得以从这些历史典籍中窥见以往年代的社会治乱、朝代兴衰、政教得失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我们在接受、领悟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赐予的时候，对历史上那些优秀的史学家，不禁由衷地产生出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

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们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独特的、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学家的职责作为文化领域的一种分工，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史学家工作的成果是反映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与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记载及依据。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之所以被完整地记载下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至今还可以脉络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是古代史学家的一大功绩。

在这套“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中，我们选择了8位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入传，用以反映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及其在各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成就。这8位史学家是：司马迁（西汉）、班固（东汉）、刘知几（唐）、杜佑（唐）、司

马光（北宋）、郑樵（南宋）、章学诚（清）、梁启超（近代）。这8位史学家是包括从西汉到近代的史学家的代表，他们的著述和思想反映了中国历史典籍的多种体裁，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各个领域包括历史记述、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跟社会的关系以及史学变革与创新的辉煌成就。

司马迁著《史记》，创纪传体（综合体）通史，并以其深刻的历史哲学、生动的历史表述和以多种体例相配合，描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前期大约3000年历史大势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以及各阶层代表人物的言论、行事与历史功过。《史记》的伟大成就，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

班固受《史记》的影响而断代为史，著为《汉书》，开封建社会皇朝史撰述的先河。《汉书》中的10篇志，在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有突出的贡献。后人把《史记》、《汉书》尊为历代“正史”的开山之作。

刘知几以批判的眼光，自觉地对以往的史学工作进行回顾和审视。他著的《史通》一书，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在中外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杜佑重视史学的“经邦”、“致用”，所著《通典》一书，创典制体通史而意在“将施有政”。他是一位通晓政治的史学家，又是一位洞察历史的政治家。

司马光主编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叙战国到五代1300余年史事，旨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一部“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的宏伟著作。

郑樵继承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阐扬史学的“会通之旨”，所撰《通志》一书，是纪传体（综合体）通史，而其卓越成就尤在于《通志·略》，显示了他在典章制度、名物训诂、自然知识方面的造诣。

章学诚生活在考据之学盛行的乾嘉时期，而他治史的旨

趣却在于理论的追求，所撰《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从理论上总结了18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辨“史法”、“史意”之区别，论“史德”、“言公”的重要，发展了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说等等，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上提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先驱，他在20世纪初年提出的“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理论，批判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史学改革和创新起了开拓性的作用；他在本世纪20年代的历史撰述，涉及到历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许多领域，在中国近代史学上有广泛的影响。

从司马迁到梁启超，这是一支宏伟的队伍，是一座丰厚的宝库，是一个优秀的传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史学家的不同风格和特点，不同的成就和贡献，看出中国史学的连贯、繁富和成熟。

从司马迁到梁启超，我们能够列出有成就的史学家可以以百数，他们的著述，可以汗牛充栋；他们的贡献，可以彪炳千古；他们的传记，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的一部传记体的中国史学史。从我们所介绍的8位史学家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部中国史学史，该是一座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宝藏！

中国史学在两三千年的积累、发展中，不但造就了众多的优秀史家，也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里，我只想说明两点。

第一，能不断创新的传统。

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任何一个时代的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都是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后代史学和史学家对于前代史学和史学家，既有继承，又有批评，既有扬弃，又有创新。这种继承、批评、创

新、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史学内容愈益丰富、体裁愈益多样、范围愈益扩大、方法愈益完备、史观愈益进步，而终于走上科学轨道的过程。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迁延证明了这一点，而从古代史学到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进而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的转变，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继承发展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科学事业。史学工作者在向这个科学高峰攀登的过程中，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反复的科学实践。这种探索和实践，绝不可忽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不可忽视中国史学遗产给予我们的启示。

第二，是关注现实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史学与每个时代的政治息息相关。从孔子因“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而“作《春秋》”开始，后世许多史家，虽各自的史学思想、政治见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脱离现实、离开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治乱盛衰去空谈历史。至于近代中国的许多著名史家如魏源、梁启超、章太炎诸人，他们本身就是政治革新家、维新志士和革命志士；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则是共产主义战士，历史学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专门的科学，同时又是维新和革命战斗的思想理论武器。尽管这个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式，但也有贯穿古今的精神本质，这就是史学家们对国家、民族命运和“世道人心”的关注，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正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继承和发扬的优良史学传统。

盛世修史，继往开来。值“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推出之际，谨抱病以陈言，怀古贤，励今哲，翘首于后生。此乃一老史学工作者之赤诚也。

1995年7月

前 言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政治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辉煌的境界。他是精于治道的史学家，又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他在这两个方面为中华历史文化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书要向读者叙述和评论的就是这样一位极特殊的文化名人——杜佑。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出身于有名的门阀之家，以父亲的军功而荫补入仕，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朝，从县丞做到宰相，风风雨雨，宦途60年。杜佑做人、为官的宗旨是“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一是重人，二是俭用。他的全部政治生涯，都是在努力实践自己的思想和宗旨，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德、顺、宪三朝皇权更迭之际，是稳定政局的人物之一。他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和对于民族关系的调整及有关政策的制定，表明他是一位很有远见的政治家。唐宪宗称他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

是国家的栋梁。杜佑不愧为中唐历史上的一位名相。

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就其创造性和历史影响的长远性来说，又超过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他是在司马迁之后，继承、发扬史学上的“通古今之变”的一位大师。他用36年时间撰成的历史巨著《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典章制度史，为典制体史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通典》的成就，首先在于作者从古代政治文化的角度着眼，以“法制”即历代典制为经，以“政经”即前人论议为纬，把典章制度的发展衍变以及人们对有关典章制度在实际贯彻中之得失利弊的评论、分析，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方面看待，从而进一步开拓了历史认识和历史撰述的领域，从理论上奠定了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基础。而典制体史书的发展，从全局上改变了史学发展中编年、纪传“角力争先”的格局，对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通典》的成就，还在于作者对历代典章制度有明确的和清晰的分类，以及在分类上的逻辑思想。《通典》共分9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个分类上的逻辑思想是：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先中央，后地方；先内地，后边疆。作者认为，政治的首要目的是“行教化”，而要“行教化”必须使人民“足衣食”。作者引用《易经》、《管子》、《论语》的论点以证己说，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食货被列为《通典》各门之首。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视而在历史撰述上作这样的安排，是作者的首创，是中国古代史家在历史认识上的重大进步。

《通典》的成就，又在于作者在全书中贯穿了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通典》所记上起黄帝，下迄当世，叙历代之典制，汇前人之经验，但它并不非今是古，厚古薄今。作者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为了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政策上的借鉴，而不是为了恢复“古道”。他认为：从

总的形势来看，“圣唐之盛，迈于西汉”。他认为正确的政策对于人材的培养具有关键的作用，“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他列举历史事实证明：封国之制的削弱，是一个必然趋势，“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认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华夏族也有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夷狄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是有客观上的原因的，因此不应当“贵中华而贱夷狄”，等等。作者的朴素历史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因为他尊重历史事实，从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比较中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认识。

《通典》的成就，尤其在于作者“经邦”、“致用”的撰述旨趣。作者自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而对学以致用有浓厚的兴趣和坚定的目标。他明确提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的撰写，本为施政所用。而《通典》的撰述，伴随了他的十分之六的宦途生涯。其间，政治实践的感受，有助于他的历史认识的深化，而历史认识的深化，则更加明确了政治实践中的抉择。因此，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既蕴含在《通典》之中，也体现在作者的政治实践之中。他说的“理道不录空言”，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双重的统一。

自唐代至近世，《通典》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赞扬它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爬梳、分类，详其源而尽其流。《旧唐书·杜佑传》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章学诚称赞它“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梁启超认为：“《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第二，是赞扬它的“会通因仍之道”。马端临《文献通考·序》称：“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章学诚称赞《通典》“以典故为纪纲”而成为“史部之通”的一个方面。